

张执浩

著

水穷处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长江文艺出版社

水穷处

张执浩
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
（武汉）

新出图证(鄂)字 0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水穷处/张执浩 著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6.10

ISBN 7-5354-3312-X

I. 水…

II. 张…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87480 号

责任编辑:沉 河

责任校对:陈 琪

装帧设计:杨晓芸

责任印制:左 怡 邱 莉

出版: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地址: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长江文艺出版社

邮编:430070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7679362 87679361 传真:87679300)

<http://www.cjlap.com>

E-mail:cjlap2004@hotmail.com

印刷:湖北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640 毫米×960 毫米 1/16 印张:16.25 插页:2

版次:2006 年 10 月第 1 版 200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197 千字

定价:23.00 元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87679307 87679310)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爱的对立面也许不是恨，而是冷漠、懈怠或神经质。当我试图用那些沉睡在心底的爱的碎片拼合出“爱人”的容颜时，看见的往往是一张张被时光扭曲的脸。似乎总是这样：当我说爱，爱已不在。于是，才有苦苦的寻觅和担当，才有拯救与逍遥。我相信，无论光阴如何流转，这幕人世间最旖旎诡秘的剧情永远不会中断，而你我都不会仅仅是旁观者。我们感同身受，我们爱恨交织。

■ 张执浩

第一章

午间休息时，我居然站在落地窗前迷迷糊糊地做了一个怪梦。在这个梦里，我既是被告又是原告，还是公诉人、辩护律师和法官、书记员。庭审开始了，我上蹿下跳地忙碌着，整个法庭里面除了若干个我，再也没有别人。也就是说，我既是六个人，同时又是六分之一个人……我拼命撕扯着自己，又极力将遗失在各处的身体的碎片拼合在一起。法槌砰砰地敲打着沉重的桌面，可是我怎么也安静不下来……睁开酸涩的眼睛，我终于发现这不过是个噩梦而已，但心跳声依然清晰可闻。此刻，我的脚下是这座庞大的、被各种尘烟笼罩的城市，正前方是这座城市的标志性建筑——黄鹤楼，在明艳的阳光下，红色的琉璃瓦闪耀着刺眼的光斑。我猛然拉开玻璃窗，朝外面使劲吐了一口唾沫。一阵狂风扑过来，将唾沫星重新还给了我。我悻悻地骂了一句，转身去盥洗间洗脸。我出来时看见秘书小柳正掩门而去。我的目光从她瘦削的肩头滑落到宽大的枣红木办公桌上，只见桌面正中央端放着一只白色的信封，不用看，我就知道封皮左上角写着：好望角广告策划公司张望先生收。右下角寄信人一栏写着：内详。

应该是第五封了吧。

我在心里嘀咕了一声，极度烦躁地拿起信封，右手持剪，准

备拦腰将它一分为二。想了想，又将剪刀放下，把信塞进抽屉里。怎么办呢？事到如今，回避已经不再可能，正视吧，却又找不到任何线索。我知道，在这个世界上，在某个隐秘的角落，这封信的主人正冷笑着注视着我的一举一动，我越是心神不宁，她就越是兴高采烈。是这样吧？陌生人，恭喜你的阴谋得逞了。

我魂不守舍地坐在办公室里。我把抽屉拉开又合上。我掏出手机在电话簿里漫无目的地搜寻熟人名单，哦，那么多的人我都认识，但能在此时为我分忧的却没有一个。这是个问题，在这座将近八百万人口的城市里，我生活了十多个年头，认识的人大概也能以四位数计了，但当需要有人与我推心置腹时，他们居然集体消失了。想到这里，我再次郁闷地站起身，叼着半截雪茄走到百叶窗下，将窗叶拉起，朝远处看去。我一无所视地望着混沌的天空，天上明明有太阳，但你就是看不清它究竟处于什么位置，也闹不明白阳光洒在了哪些地方哪些人的头上。我索性将脑袋伸出窗外，一阵凉意很快就贯彻了我的脑海。楼下，甲壳虫一般的车辆和蝼蚁一般的人流散漫而有序地蠕动着，我再一次感到了眩晕。我始终不理解恐高症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它算得上“疾病”么？第一次意识到自己有些恐高大约是在五岁左右，那时我刚刚与哥哥分床，独自睡在那间由过道改成的房间里。当天夜里，我梦见一个接一个娃娃从空中往下跳，他们五颜六色，边跳边发出叽哩哇啦的喊叫声。我被这样的喊叫声吓出了一身冷汗，睁开眼睛发现周围一片漆黑，只有屋顶上那块半尺见方的亮瓦映现出夜空的清白来，顿时觉得自己好像是从天上掉落在床铺上面的，是那些看不清嘴脸的若干个娃娃中的一个。我在黑暗中捂住怦怦乱跳的心窝，在被子里紧紧地蜷缩成一团。后来我暗自锻炼自己的胆量，走独木桥，攀高树枝，结果却适得其反。及至今日，莫说从高处往下看，哪怕是闭上眼睛想一想陡峭的山壁或楼层，我都会呼吸困难，心跳加快，严重的时候几近虚脱。我命令自己不要去想那些悬崖、过山车、索道、蹦极，那些玻璃马赛克的高楼，可反而想得越发频繁，如同瘾君子陶醉于吸食吗啡过后

产生的瞬间失重、轻飘和眩晕，而无力自拔。

就在这种几近虚脱的状态里与街市对峙了近一刻钟，我缩回脑袋，拉下窗叶，回到过于宽大的红木桌边坐下。我再次重复着刚才的动作：把抽屉拉开，合上，再拉开，再合上；在手机的姓名栏目里搜索，最后，我决定给吴起打个电话。

我叫张望，好望角广告策划公司的法人、老总。当初我把公司取名为“好望角”，无疑效法了早年欧洲探险者的不屈不挠精神：在无望中看到了希望，在希望里满怀想望。嗯，大致就是这个意思吧。

几年前，我买下了这套精装修的房子用于办公，它位于本市最醒目的商业大厦之一——江天富豪写字楼的第23层。事实上，这里也是我主要的生活区，将近三百平方米的面积被我隔成了工作和休闲两个相对独立的区域，工作区被电脑写字台分割为一个规则的方格子，员工们秩序井然地坐在这些四方形的格子间，各司其职；生活区呢，则由颜色夸张的布艺沙发、弹簧床垫和羊毛地毯、壁挂所组成，这些都是我从各处搜罗来的，有的是托朋友从外地买回来的，我将它们不规则地摆放或悬挂起来，慵懒、随意，富于浓郁的消闲气息。一天之中，我的大部分时光都是在这里度过的，我很少下楼，除非有人拿着支票在下面某个地方等我，哈，当然，这样的好事不会常有。公司的业务主要来自一些固定的老顾客，每年我都能从他们那里拿到一定数额的订单，以此维持公司的正常运转。渐渐地，我成了一个被高处宠坏的懒汉，一个自我囚禁者，一个“天堂看门人”——这是朋友们对我戏谑的称呼。每天早晨一觉醒来，我就会含着甜津津的牙刷，身不由己地走到宽大的落地窗前，用食指撩开百叶窗的那三张叶片（因为总是习惯性地拨拉那几片，它们的颜色看上去要比其他叶片略深，而且有些变形了），眺望城市睡眠惺忪的表情，杂乱而有序的楼房，以及从楼道之间腾涌出来的雾霭和尘埃，被一阵狂风吹往空中的塑料袋，越来越嘈杂的马达声……我喜欢这样眯着

眼睛打量这个有身无形的巨人，它的确像个无头无脸的庞然大物，我们看见的不过是它身体的皱纹，衣带上的褶子，听见的也不过是它的哈欠声、喷嚏或咳嗽，而手之所触也不过是它极度臃肿肥厚的皮肉，如同盲人摸象。三十多年的人生经验告诉我，当你被迫与这样一个巨人遭遇时，你应该尽可能地表现得谨慎和谦卑一些，以免被它捏为齑粉。

最近一段时间，我却一反常态，每天都要下楼了。下班后也不再在酒吧、茶楼或其他娱乐场所逗留。一落地，就大步流星地直奔停车场，驾上我的“奥迪A4”匆匆往家里赶。与那些十分规矩的好男人一样，我越来越像个称职的丈夫了。回到家，我就进厨房忙碌起来，首先检查冰箱，如果食物充裕，就亲自动手烧几样拿手菜；如果冰箱是空的且时间也来得及，我就会去一趟隔壁的家乐福超市，买些罐头、蔬菜和鲜牛奶，抢在杨芬按响门铃前，做出几盘简易又美味的菜，摆放在雅致的乌柏木餐桌上。

杨芬是我的妻子，市实验中学的语文老师，兼高一年级的班主任，她课上得好，曾多次被学校推荐参加全市语文教学观摩，并获奖，本地《晨报》不久前还做过关于她教学成果的整版专访。我们已经在一起共同生活了九年零四个月，前三年甜蜜、快乐，近些年愁闷、悒郁，其间的转折缘于婚后第四年发生的一场事故：那年初春，她感觉身体不适，去医院检查，结果被查出子宫里面长了几个良性肿瘤。本来这病是可以通过吃药来进行治疗的，但杨芬要子心切，不想因此耽搁了生育的最佳年龄，坚持要去做手术，哪知道不负责任的医生居然“不小心”切掉了她的子宫，从此丧失了生育能力。

经此打击，我们都几乎精神崩溃。杨芬在得知自己今后再也无法生育后，一次次寻死觅活，我则在一边仔细照顾，含泪为她宽怀。我对她说，其实我一点都不稀罕小孩，即便他（她）是个天使，也觉得是个累赘。我言不由衷地说着类似的谎话，发誓，赌咒，天花乱坠，口是心非……直到那么一天，杨芬说了这么一句话：

“张望，我们还是离婚吧，你这个人太虚伪了。”

虚伪？离婚？我有些不解地愣住了，咬着下唇，尽量不动怒火。

杨芬提出和我离婚，我当然不会答应，老实说，我还是爱她的，尽管爱的激情已经消失殆尽，但爱的惯性依然还在我们之间延续。在我看来，爱到最后就是一种习惯。再说，她为我、为这个家作出的牺牲实在太大了，我可不愿意做不仁不义的小人，被人在背后戳脊梁骨。杨芬说这样对我们家不公平，她还拿出我那位不久前才去世的母亲的临终遗言来说事儿，“我不能给你们张家延续香火，你母亲若泉下有知，也不会安宁的”。

我出生在中原地区的一个“琴瑟世家”。我父亲自幼跟随他父亲学习琴艺，二十来岁就成了中原琴派的代表人之一。父亲一生与古琴为伍，不谙俗世，生性高洁，也因此在一九七九年文革时期饱受磨难。我母亲其实是个乡野女子，她和父亲的相识相爱极具传奇色彩，父亲总说等自己老了一定要将他们的故事写成小说，当然，直到母亲病故身亡，他也没有能力将这个计划付诸现实。据说，父亲十九岁那年遵从父命前往林区选购琴木，在一户农家遇见了我母亲，两人一见钟情。回来后他终日郁郁寡欢，在爷爷的逼问之下，父亲才道出了原委。不久，父子俩再次跋山涉水来到那户农家，爷爷也一眼相中了眼前这个聪明伶俐的女孩，于是将她带回家，收为女徒。等到两人到了合适的年龄，便促成了这桩婚事。照理说，我的家人应该都是很开通的性情中人吧，可他们在对待哥哥和我的前途及婚姻的事情上显得极其保守。首先，他们要求年长我五岁的哥哥学琴，但哥哥最大的梦想是成为军人，父母坚决不同意，逼他习琴，最后导致哥哥不惜以自残的方式相抗：我们家的古琴都是自己制作的，屋子里随处可见刨子、凿子、锯子和斧头什么的，一次，哥哥趁帮助父亲干活的机会，用斧头剁下了两截左手指头。在一声“哎呀”的惨叫之后，哥哥换回了给自己前途做主的机会，父母再也没有强迫他习琴，可是他

也没有能够如愿成为一名军人，而是进家具厂当了一名木匠。直到改革开放以后，哥哥才凭借自己精良的手艺成了一家家具厂的老板。

父母特别看重家族香火的延续，虽说哥哥已经为我们张家生育了一儿一女，但他们仍然希望我和杨芬能尽快有自己的孩子。我没有哥哥那么叛逆，在父母的催逼下我从小就认真习琴，最后顺利地考进了一座远近闻名的音乐学院，毕业后留校任教。大概因为我继承了他们的衣钵吧，所以他们在对待我的婚事方面特别挑剔。当初我领杨芬回家，母亲居然首先看中的不是人家的性格长相什么的，而是杨芬的臀部。母亲悄悄将我拉扯到一边，指点着杨芬说道，这孩子胯骨宽大，臀部结实，说明她有很强的生育能力，一定可以为我们的家族添丁加口。母亲的话让我哭笑不得。刚结婚的那阵子，我和杨芬都忙于各自的事业，谁也不想被小孩拖累，所以，三次受孕都被我们毫不留情地干掉了。“报应啊，”现在，杨芬痛哭流涕地说道，“当初每流产一次，我就会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没想到报应终于还是落在了我的头上。”要是当初我们就把孩子要了下来，现在会怎样呢？杨芬反复在这样的假设中打转，度过了将近一年的以泪洗面的日子。之后，才逐渐振作起来，投入到了废寝忘食的教学工作中。

事故发生以后，院方不想扩大事态，就通过熟人牵线搭桥，答应私下赔偿我们一笔在当时看来还算数目不菲的损失费，并承诺将医院的一个广告项目交由我的公司代理。杨芬起初坚持起诉院方，非要将主治医生绳之以法不可，我权衡再三，晓之以理，在做了大量的疏导工作以后，她才勉强接受了对方的歉意。俗话说因祸得福，我的公司果然在这件事情发生后才逐渐打开局面。

做完饭菜，我打开电视机，一边看经济新闻节目，一边抽着烟耐心等待杨芬回家。“花生”跳上沙发，偎依在我身边，两条前肢搭搁在我的大腿上，含情脉脉地望着我。每逢这样的时刻，我总觉得她有话要说，同时又胆战心惊地想到，如果某一天她真的开口说话了，我会不会被吓个半死呢？“花生”是一条并不名

贵的杂毛母狗，如果仔细考察她的血缘，应该是西施犬与蝴蝶犬杂交的产物。“花生”这个名字是我帮助取的，因为我第一眼看见它就觉得它酷似一颗没有去壳的花生。杨芬在她学校大门口捡到了它，刚捡回来时有一身柔顺的白色毛发，但长到后来就成了眼前这个样子：鬃毛蓬松，杂乱无章，躺在那里，酷似一团陈年败絮。俗话说，丑人多作怪，丑狗多聪明。此话在“花生”的身上得到了完美的验证。“花生”的确是一条极其聪明的狗，能察言观色，似乎可以洞悉主人内心世界里的喜怒哀乐。她给人的印象永远是那样乖巧，而她的神态又永远是那般楚楚动人。她是杨芬精神上的伴侣，我清楚，这几年杨芬施加在“花生”身上的爱怜已经远远超过了我。可是，我并无醋意，相反有一种解脱感。

我抚摸着“花生”柔软的毛发，想集中精力将电视里正在播放的那个有关煤矿瓦斯爆炸案的现场采访看完，但我发现，今天我的注意力比前几日更加涣散了，眼睛盯着电视屏幕，耳朵却在谛听楼道里的脚步声。她早该回家了，平时这个时候都回来了啊，她怎么还没回来呢？我时而瞟一眼电视，时而瞅一眼餐桌上冒着热气的饭菜，心烦意乱。

这时，“花生”突然跳下沙发，带着我遗留在她背脊上的手掌的余温，叮叮叮地跑向防盗门，狺狺地摇头摆尾，“张望”着楼梯口越来越近的脚步声（我相信，她能透过厚重的铁门看见杨芬的身影）。

杨芬回来了，肯定是杨芬回来了。

杨芬不止一次与我讨论过领养小孩的事。她在网上查阅、收集了很多这方面的资料，悉知领养孩子的一切手续、细节。在她看来，领养一个孩子并不比领养“花生”麻烦多少（虽然“花生”连领养都谈不上），一只杂种狗都能养成这样，难道还怕养孩子吗？她丝毫不担心自己在这方面的能力，但无论她怎样好说歹说我却始终无动于衷。我的理由很简单：与其花大量的精力替人家抚养一个孩子，不如节省力气多干些自己喜欢的事。杨芬说

我偏执，她说，你怎么能说是在为别人抚养呢？事实上，这样做完全是为了我们自己。问题是，我觉得我们现在这样就很好，也合乎现代都市人的生活潮流，如果真有了这样一个小孩，我习惯性地摊了摊手臂，狡辩道，我们假设一下，倘若这孩子脾性与我们已经形成的生活习惯有较大出入，那该怎么办？杨芬盯着我呆望了半晌，喃喃道，没想到你是这样一个自私的人。我自私？！我恼火道，你这样做才叫自私呢，你想随便用一个孩子来填补自己生活的缺憾和空白，说得更直白一点，为了防老而去领养一个人家的孩子，这才是真正的利己行为。杨芬气得直掉眼泪，转身进了卧室，砰地关上房门，再也懒得理会我了。

但我知道，她从来没有死过心。她的办公桌抽屉里塞满了收集到的各个年龄段的孩子的图片，有些是从杂志画报上剪裁下来的，更多的是从网上直接下载的。她把她们按年龄顺序编订好，制作成了一本本精美的剪报画册，在课外之余拿出来翻阅。那是一个隐秘的世界，一座无人知晓的人间天堂，灿烂的阳光照耀着五颜六色的童年，天空永远是那么蓝，草地永远是那么绿。杨芬把孩子们的欢笑声关闭在这个逼仄幽暗的抽屉里，当她小心拉开抽屉时，内心就变成了一座波光荡漾的蓄水池。我还知道，杨芬之所以回家这么晚，是因为她要在学校与那些被她私下“供养”着的孩子们多待片刻。她从不把那些图片带回家，她渐渐爱上了这种隐秘的生活，并深深地陶醉其中。有好几次，已经很晚了，杨芬还没有回家，我去学校找她，她却不在，那个收发室的门卫老头告诉我说，“杨老师去幼儿园接孩子去了。”我就知道，她去了那种场所；我就知道，她的魂已经脱了窍，再也没有办法能找回来了。

我们就这样挨着、撑着，一天天滑了过来，像脚底装上了滑轮，一晃就蹿进了冗长、乏味的中年期（没有小孩，家里缺少笑声，“中年”被大大提前了）。尽管由于没有生育的拖累，也不必担心被琐碎的日常生活划伤皮肉，杨芬看上去还很年轻，她的小腹没有同龄女人那种多余的脂肪和赘肉，脸上也看不出什么明

显的皱纹，可是，当她在不经意之间发出的那一声声长吁短叹时，她内心里的那个窟窿还是暴露无遗，那个北风呼啸的窟窿，那个伸手不见五指的风洞，惟一的光亮来自那些经过她脑海里的瞬间的幻觉：作为一个没有生育过孩子的母亲，她用另外一种方式把自己纳入了“母亲”的行列。当她回到家里，坐在沙发上或床头上，满怀深情地凝望“花生”时，当她把柔韧的手指插进“花生”轻柔、潮湿又灼热的唇齿之间时，当她紧紧搂抱着“花生”、并将脸埋进那蓬松的散发着洗发水与动物特有气息的毛发里时，她的神情是那样专注，目光是那样迷离，笑容是那样满足。我一再提醒她，不要和狗相处得过于亲密，以防狗身上的寄生虫带来病菌，但杨芬的回答总是干脆而果决：“不就是担心流产么？一个连子宫都被切除了的女人还会担心这个吗？笑话！”

我无言以对。我开始担心起杨芬的精神状况来，我利用节假日开车带她出门转悠散心，陪她逛街、购物。然而，我的各种努力都收效甚微。不管身在何处，杨芬只要看到小孩就会心跳加快，呼吸急促，脸也涨得通红，像一个准备行窃却不慎露出了马脚的小偷。只见她尴尬地站在马路旁，手足无措，不知如何是好。那样子真让我难受。时日一久，我不得不重新考虑杨芬提出的那个领养小孩的方案来。

大概是去年的这个时候吧，我们听说第三人民医院有弃婴可以领养，就再一次动了这个心思。我托朋友的朋友找到妇产科的一位大夫，礼物也送了，电话也留下了，只等遇见一个合适的婴儿就抱过来。那段时间杨芬显得异常激动，每天都要去夜市买婴儿用品，从尿不湿到纯棉内衣，她一包一包地往家里搬运，只差婴儿床没有买了。事先，我们商量过了，小孩过来以后先与杨芬睡，等培养出一段感情后再让他（她）睡自己的婴儿床。我答应她买张漂亮舒适的婴儿床，至于将这张小床放在什么位置，是与我们的大床并置，还是放在脚头，杨芬都比划过许多次，并用彩色粉笔作了标识。半夜三更她突然醒来，怔怔地凝望着那个粉笔画的床位，脸上的表情变幻莫测。她不断征询我的意见：“是要

男孩还是女孩呢？”“男女都一样。”我打了个哈欠，回答道。“你是不是不情愿啊？”她摇晃着我的肩膀，沉浸在几乎就要伸手可及的幸福里。我哼哈几声，搪塞道：“说什么哪，哈，不要猜疑，只要你情愿就好。”“这说明你还是不情愿。”她生气地扭过头去，背朝衣橱嘟哝着。

只要电话铃声一响，杨芬就会扑过去将话筒连同话机抱在怀里：“喂，马大夫吗？哦，对不起，找张望啊，他在的。”她把话筒递给我，脸拉得老长老长的。

“张望啊，每次打电话你老婆怎么都问我是不是马大夫啊？嘿嘿，你可要留意点，别搞得后院失火啊。”朋友调笑着，和我谈论生意上的事情，谈最近一次猎艳收获，或另外一些乌七八糟的东西，如果我们聊得时间稍稍久一点，杨芬就一定会故意在旁边弄出大动静来，提醒我该挂电话了。“你老是占线，马大夫的电话怎么打得进来呢？”她责怪道。

又过了几天，马大夫终于来电话通知我们去看孩子了。

现在回忆起那晚发生的事情，我依然心有余悸。事情是这样的：那天晚上我和杨芬去了三医院，马大夫的办公桌前坐着一个皮肤黝黑身材矮小的男人，经介绍得知他就是孩子的生父，小孩正在生产中。我很奇怪马大夫为什么要让我们见这个男人，尽管他事先曾交代过这事能否成功他自己也没有把握，但那个男人的话却让我大吃一惊，一见面，那人就很露骨地说道，“就八千吧，看得出来你们出得起这个价。”我一时没有反应过来，连忙把马大夫拉到一边问他是怎么回事，马大夫说这对夫妇是从外地来这里打工的，他们想要儿子，结果B超鉴定出是个女儿，所以就想找户富裕的人家把孩子处理掉。我一听这话就很不舒服，倒不是嫌价钱贵，而是觉得这样的父亲不可能生育出什么高质量的孩子来，有其父必有其子嘛；还有一点就是，这个人长相太贪婪，弄不好今后被他缠上了可就麻烦大了。我回头去找杨芬谈自己的想法，却见她正扒在育婴室的玻璃窗前，痴痴地朝里面观望。那个男人跟在她身边，絮絮叨叨地说着什么。我走过去，问

杨芬孩子是否出来了，她说出来了，你看看，好多啊。我朝里面望去，果然有好多婴儿躺在一排排小床上。我问她是哪个，她摇了摇头。这时，马大夫过来了，他带我们进病房看孩子的生母。我们一进去，就瞧见那女人眼圈红肿，一看就知道才哭过。她丈夫本来跟在我们后面，突然三步两步抢在我们前面冲到了病床边，对那个女人耳语了几下，见女人还哭丧着脸，就猛地抽了她一耳光。幸亏马大夫及时过去制止了他，不然男人还会揍那女人的。我在距离病床几米开外的地方站下，已经决定不再在这件事情上浪费时间了，这样太不人道，于这位母亲，于我们，于那个尚未见面的女婴，这样做都是一件极其残忍的事情。我退出病房，在门口站了大概十来分钟，杨芬才红着眼睛出来，显然她也哭过了，我过去抚了抚她的肩膀，说道，回家吧，我们回家。杨芬点点头。

一回到家里，杨芬就直奔卧室，打开衣橱，将那些准备好的婴儿用品一股脑地拽出来，扔在床上，又胡乱塞进塑料袋里。我问她想干什么，她不吭声。只见她默默地拎起袋子下了楼。我以为她是想把这些东西送到医院送给那对夫妇的，哪知她走到院子西边的那棵粗大的梧桐树下，一把火将它们点燃了。等我闻到焦糊的气味快步赶过去时，那些衣物已经烧得差不多了。杨芬蹲在地上嘤嘤地哭泣，火光一闪一闪地照耀着她潮湿的面容。

从此以后，杨芬再也没有在我面前谈及过抱养或领养孩子之类的话题。我感到自己如同一个生活在某座活火山身边的土著民，掐不准什么时候火山就要突然爆发，灿烂而炫目的熔岩将把我埋葬。

吴起是那年流感席卷全国时我认识的一个做药品器械生意的老板，当时，满街都是戴口罩的人。口罩成了紧俏物资。吴起利用关系搞到了一批，又通过别人的介绍找到我，希望为他手中的那些口罩设计一个别致的图案。我为他设计了一个由两根小拇指头勾连成锁状的效果图，结果他的口罩在市场上大受欢迎，很快

就销售一空。这以后，我们就成了来往密切的朋友。

我打电话给吴起请他晚上去“巴山夜雨”喝茶。他正好闲着，就说早点去吧，五点半见面如何，我说好。

我们俩要了两份煲仔饭吃了，另外要了些啤酒，和一壶大红袍，慢慢品着。吴起问我最近在忙些什么，我回答说瞎忙。吴起又问我最近有了新欢没有，我说哪儿啊……在闲聊了一阵子后，我把话题转向了他的情感生活上。吴起以前给我讲过他辞职下海的原因，他说如果不是自己当年缺少把持，就不会走上经商之路，那么现在，他至少也混到了政府部门的某个正处级位置。事情是这样的：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吴起去重庆参加一个会议，因为会议时间长达十多天，多少有些无聊。他的几个在当地的大学同窗为了让他的业余生活丰富多彩，就天天晚上拉他去外面喝茶玩乐，后来就认识了一个漂亮的有夫之妇。巧的是，这女子的丈夫那段时间正在东北某地开会。吴起要下了那个女子的手机号码，然后约会她，一来二往，两人就好上了。会议结束后吴起回到武汉，回到了正常的家庭生活中。他那时候已经结婚生子，小孩都三岁了。吴起再也没有和那个重庆女子有过任何联系。转眼到了千禧年，吴起对新世纪也做了新的指望。有一天，他忽然接到了那个重庆女人的一个电话，催他抽个时间过去一趟。吴起以为那女人肯定是想念他了，他喜欢这种被女人思念的感觉，这是体现一个男人成就感的一个方面。他抽了个周末直飞重庆，在下榻的宾馆见到了一位带着一个男孩的女人。女人一进门，就将身边的男孩往前一推，说道：

“快叫爸爸！爸爸！”

吴起蒙了。

原来，这个五岁的男孩是吴起那年来重庆时风流快活的产物。女人原本不想让吴起知道这件事情的，她不想破坏自己和别人的家庭，她想独自担当起这桩孽债，慢慢偿还。哪知纸终究没有包住火。男孩越长越不像他的父亲，也不怎么像他母亲，身边的人议论纷纷。于是，那个疑心很重的男人在软硬兼施、再三盘

问无果后，就带儿子去医院做了个DNA鉴定，结果是：他果然不是这个孩子的生父！

无奈之下，女人道出了这件事的原委。

那你们想怎么办？吴起硬着头皮问道。适才他仔细打量过那个男孩的相貌，几乎就是他本人的缩影。

我把你喊过来只是想对你讲有这样一事实而已，女人有些委屈地说道，我们从来没想把你怎么办，只是想让你有个心理准备……

准备什么？吴起满不在乎地说道，我可没有什么值得准备的。

他想起诉你，告你……女人抚摩着孩子的脑袋，低声说道。

谁？你丈夫？吴起觉得那个没见过面的男人很可笑，自己老婆被人睡了，而且还生了个别人的孩子，居然现在才想到起诉我。但转念又想到，如果我被起诉，那我的事业、家庭可就全毁了。你丈夫有什么打算？吴起问。

申明一下，他现在已经不是我丈夫了，我们分居快一年了，女人说，他会向法院提出诉状的，他说过，必须惩罚你，还要你赔偿他二十万元的精神损失费……

吴起对我说，后来他被迫辞去令人眼红的国家公职，家庭破裂，不得不走上这条充满荆棘和坎坷的经商之路，都是当年在重庆不慎种下的恶果，屈指可数的几夜风流，换来的是绵绵无期的一条不归路。

第一道茶水很浓酽，近似于苦咖啡。吴起放在鼻尖下闻了闻，抿了一小口，但我一口干了。吴起望着我，我最近脸色有些灰暗，睡眠不好，他问道：“你看上去不对劲，是不是有什么心事？”

我摆摆手，回答道：“没有，真没有，可能是天气原因，你瞧，这鬼天气压抑得很，秋天了，居然不吹秋风。”

吴起说：“你办公室那么高都感觉不到秋风，我们岂不更郁闷了。”说到这儿，他招手让服务员过来续水，抬头看了看窗外，